

晕
眩



南 丁 文 集

随 笔 卷

晕 眩

河南省直作家协会 编

河南文艺出版社

随笔卷·晕眩

一点体验	9
请歌颂光明	12
怕从何来	14
“糊涂涂”、“常有理”、“惹不起”	19
当好一个兵	21
再谈怕从何来	24
焦裕禄的悲剧	29
风格梦	33
仿佛还不是回首往事的时候	37
希望	40
年轻时未做完的文学梦	42
《奔流》和我	44
寄希望于南阳	47
漫话创作自由	49
黄金时代	52

55 窗口

——代发刊词

57 寄《村语》

59 春天的话题

61 话说摇篮

63 我们共饮黄河水

——第二届黄河笔会断想

66 打开你的门

68 没意思的文章

71 废话不连篇

73 关注文学社团

76 自白

77 《河南日报》和我

79 贺《河南画报》十岁

81 匆匆行色依旧

——速写顾丰年

84 时代呼唤劲草

87 想起了丹柯

90 闲话“第一篇”

94 晕眩

98 成熟不成熟

100 几点想法

103 阅读感受一种

105 英俊少年

107 关于书的随想

少年读书时	111
对花甲的误读	114
新年，种一棵树	118
浪漫二题	121
开心	126
营造绿地	129
对警察说	131
走进寻常百姓家	133
金水河一座城	135
害怕过年	138
又是过年	141
诗撑开的一把金伞	143
呼唤史作善	146
与副刊有关	
——兼贺《大河文化报》一岁	148
香玉杯十年	153
游了一回苹果园	
——读《红色接力棒》	155
随想录	157
获奖与位次	160
濮阳	163
孙二娘的脚印	166
回眸一望	168
缘乎？怨乎？	170
致《散文选刊》	173

- 175 数字游戏
- 177 不该淡忘他们
- 179 感慨二端
- 182 睁开两眼
- 185 说话环境
- 188 生活情境
- 191 诗与民谣
- 194 告别人治
- 196 写在《孤独》的旁边
- 199 荒诞大师
- 202 断桥断想
- 204 金钱两面
- 208 说不完的豫剧
- 212 浪漫者何
- 214 伤心足球
- 217 七言八语
- 219 戏说流行
- 222 包装之类
- 225 画绿充树
- 228 秀色可餐
- 231 重读“老三篇”
- 235 童心叩我
- 238 救救孩子
- 241 生命狂舞与命运交响
- 245 爬山野趣

燃烧·湿润	250
珍爱生命	253
慎言美丽	256
陈年旧事	259
揭幕之战启示录	262
米卢战博拉	264
“快乐足球”质疑	266
群星陨落	268
球痴呓语	270
二〇〇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星期六	273
人往高处走	276
门外说美	280
小康随想	282
羊年流水	285
面对非典	288
小庙	290
嫁衣	294
纪念	298
糊涂	301

四月底到六月底，我们在许昌及舞阳农村住了两个月，在许昌并实际地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我想谈一点在这两个月中个人所感受到的，也算是一点体验吧。

区委郭四虎同志负责掌握推动全苗店乡的工作，另外还有乡长，乡农协主席。我初去苗店，本是一方面协助工作，一方面要完成创作任务；但我却完全卷入土改斗争中，划阶级大会，贫雇农座谈会，乡代表会以及农会会员的经常会，甚至每一个小会我都不放松；另外我还到别的自然村去讲阶级，讲五要五不要，个别访问，全乡的群众都和我熟悉了，有什么零碎的事都来找我，我也尽量帮助解决。一见面群众就热火地喊：“老何，喝罢汤啰？”我心里真是“老舒贴”。这一个月来，我确是很忙，白天没有一点空子。开会又要开到半夜。差不多没写出什么东西来，差不多忘了创作任务。

苗店土改完了，回到许昌地委，地委同志介绍我们到舞阳去，说舞阳的土改基础好，群众的觉悟高，土改后的生产情绪也一定是很高的。我们抱着希望到舞阳去看“大生产运动”。正如地委同志所说，舞阳的群众觉悟确是高，最浅显的例子就是青年

妇女普遍剪掉了大辫子，许昌的青年妇女，多半还是拖着很长的辫子的。

在舞阳，我住在一个叫姜店的村子里，也是乡政府的所在地；这个村子地主很集中，经济条件够，群众觉悟更高。我到哪里正是收麦的时候，家家都自动结合组织了互助组，整天在地里忙着收麦。初去，我想大生产运动光是“看”也不合适，就实际地参加了互助组，帮助割了几次麦；自己生长在城市，不会干庄稼活，说是帮助人家，不如说是给人家添麻烦，我割过的麦，人家在后面总要再割一次，及至对于割麦慢慢熟了，手却让镰刀割了一个很大的口子；一个老乡说：“同志，你不要割了吧。”当时，手直流血，我是真不能割了，以后我也没有再去割；我这样想：一来自己割麦又割不好，给人家添了不少麻烦，二来割麦时都很忙，没有空拉呱，又不能了解情况，对于人家对于自己都没有好处，因此便决定了不去割麦，甚至也很少去“看”割麦了。白天，人都在地里忙着，晚上，累了一天早该睡了；我不能给群众解决问题，群众也不接近我，我脱离了群众；只有在晚上，我才有机会与乡干部、青年团员在一起拉拉情况，唱唱歌。

离开了群众，离开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把自己关在乡政府里写文章，我是很痛苦的。但我想，除了如此，我对群众还会有什么帮助呢？

在这两个阶段，我体验到一些什么呢？在苗店虽然也是有缺点的，但在基本上却应该肯定，缺点就是自己被卷入工作里，对问题的调查、研究、分析、考虑都是很不够的，这当然与自己的政策思想水平很有关系，但很少去调查、研究、分析、考虑却也是事实，终日忙，忙得停留在事务的阶段，对于一个文艺工作者来说，是有搞不出创作来的危险的，我就是一个例子。但这一阶段对我个人思想情感的改造上，有着很大的帮助。在姜店离开了群众的生活，离开了群众的斗争，至多只能算是一个旁观者，这样不说搞文艺创作，自我改造都是改造不好的；在姜店我倒是了

解了一些材料，为什么写不出东西来呢？这就是说写作不是单单有了材料就能写出东西来的，最重要的还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用什么观点去处理材料，要说到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的我，又是一个立场、观点转变的问题，因此我就必须像在苗店一样深入到群众中，与群众一起生活，一起斗争，虚心向群众学习以改造自己，并要多调查、研究、分析、考虑；像在姜店，一遇到客观困难就退到乡政府里写文章，因而脱离了群众，是犯了严重的错误的。

只有立场、观点改变了，对于群众的生活、斗争熟悉了，亲切了，才有搞文艺创作的最基本的本钱，也才能搞出真正为工农兵的创作来。

我很担心，我这一点体验会不会予人以帮助或有借鉴之处呢？

一九五〇年

请歌颂光明

听《蚌埠报》文艺组编辑同志说，他们日常收到的稿件中，百分之八九十是讽刺社会的反面现象的。这使我大吃一惊，不禁想：反面现象何其多也？

如果允许按照这个比例来看我们的现实生活，那就好像是它几乎处处充斥着不合理的现象，存在着面目可憎灵魂丑恶的人物，就好像是我们的现实生活是十分可恶可怕的。当然，生活并非如此。现实生活的实际，无情地驳斥了这个荒谬的比例。

要想单凭比例数字来考察和评价一个地方的文学状况，我懂得这是粗暴和愚蠢。但是，从这个不大正常的比例数字中，不也是可以看到一种什么东西吗？这种什么东西，无以名之，如果不责怪我的话，姑名之曰：不大正常的写作情绪。

一九五六年，王蒙发表了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部作品揭露了某些人物心灵的阴暗方面，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于是，干预生活之风便在一些搞写作的人中间刮了起来。这股风，我想是也刮到蚌埠来了。《蚌埠报》收到的文艺稿中，百分之八九十是讽刺社会反面现象的，想也与这股风有关系。

可是，何谓干预生活？应该弄清楚。今年一月二十七日《人

民日报》上，马铁丁同志写了一篇文章，对这个问题有很精辟的见解。我是同意的。以我理解，他那文章的要旨是说，“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和“赞扬生活中的光明面”，同样是干预生活。

事情原本就是这样。

既然是这样，那么，作为反映生活、干预生活、帮助基础的文学，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的社会是神奇瑰丽的，我们的现实生活是充满着劳动的诗意、斗争的诗意的，生活里有多少好人哪，他们是千千万万，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数不尽。这些好人，借用土耳其诗人希克梅特的几句诗来形容：

只有初生的婴儿
才会那样纯洁，
只有两点间最短的线
才会那样正直。

神奇瑰丽的景象，充满着诗意的生活，纯洁正直的英雄好汉，以及他们所创造的丰功伟绩。这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主要方面，在文学中应该得到充分的反映，应该写这些，应该以全部热情来歌颂光明。

想来，不会有人误解我是在反对“揭露生活中的阴暗面”的作品吧。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今天我们的社会也还有它阴暗的方面的，那就应该揭露，应该像火一样地把它烧为灰烬。

但是，就反映现实生活的整个文学领域来说，只给光明面以不到百分之十或二十的地盘，那是不行的。因此，我想再重复一遍：请歌颂光明，请以全部热情歌颂光明。

一九五七年二月

怕从何来

在讨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听到了一些同志好心的顾虑：香花要放，这我赞成，但野草闲花甚至毒草都要放，不是要天下大乱了吗？《草木篇》要是送到我这个刊物上来了，我就是不发它；陈沂的《文艺杂谈》还是有道理的；唯心主义也开放了，不免有点那个；等等。这种种顾虑，我以为是反映了不相信知识分子、不相信人民群众的一种心理状况；就好像是知识分子是一团糟，要叫他们放要叫他们鸣，就必定要放出许许多多的毒草来毒害人民，就必定要鸣得乱起来，以致乱得不可收拾；就好像人民群众是很愚蠢的，他们总是把香花当成毒草，把毒草当成香花，总是不能辨其“香”、“毒”。

对知识分子对人民群众的这种假设的估计，都是错了的。

知识分子并不是一团糟，而是有了根本的变化。人民群众更不是愚蠢的，好坏、真伪、香毒，常不能逃过他们的眼睛。

知识界的状况怎样呢？经过了思想改造运动，经过了反胡适反胡风的斗争，经过了批判唯心主义的斗争，的确是有了根本的变化。我们大约有各类知识分子五百万，按照毛主席的分析，五百万中有 90% 以上是爱国主义者，是拥护社会主义的，是愿意学

习马克思主义的。而反对社会主义的，恐怕只有1%、2%，或者更少一点。

知识界的状况既然是这样，那么“放”，就真的会放出许许多多的毒草来了吗？我看不会，因为90%以上是爱国主义者，总不会放出许许多多的反爱国主义的毒草来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知识分子的状况正是重要的根据和出发点之一。

香花和毒草，也实在是难辨难分。比如《文艺报》评论员所写的《电影的锣鼓》，陈其通等四位同志的《我们对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陈沂同志的《文艺杂谈》，我最初读了后，虽不完全信服，但觉得有道理：电影的情况就是不大妙呀，除了《白毛女》、《钢铁战士》、《董存瑞》等故事片和《天仙配》等舞台艺术纪录片以外，好的的确太少，有些片子连广告费也赚不回来，这不是不妙吗？因此，当时是把它看成“香花”的。陈其通等同志指出很少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了，很少提工农兵方向了，我觉得可不是这样吗，因此，也把他们的“意见”看做“香花”。其实不然，听了传达毛主席的报告后，才看透了它们，原来不是什么“香花”，而是“右”的机会主义和“左”的教条主义的“毒草”。

可以再举一个本省的例子。文艺界的同志都很熟悉李準写的小说《不能走那条路》。这篇小说在《河南日报》发表后，受到欢迎，可是，《文艺报》发表了李琮的评论，把这小说一棍子打成了“毒草”，当时的《河南文艺》转载了这篇评论文章，并加了同意该评论文章论点的编者按语。后来，康濯同志又在《文艺报》写了文章，批评了李琮的论点，于是，《不能走那条路》又由“毒草”变成了“香花”。

以讨论得很热烈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来说，有人说它是“香花”，有人说它是“毒草”，经过讨论，意见才渐渐一致起来：它反对了官僚主义，这是好的；但主人公苍白无力，流露了